

3—6 世纪中国东北地区出土的釉陶*

彭善国

(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 长春, 130012)

摘要: 3-6 世纪中国东北地区出土的釉陶, 无论从发展的阶段性上, 还是从地域特征上, 都可以分为辽宁地区魏晋十六国釉陶以及高句丽釉陶两个系列。辽宁地区的釉陶可以分成两组, A 组釉陶的年代为曹魏末到西晋, 下限在 4 世纪初; B 组釉陶的年代为东晋十六国, 约从 4 世纪初到 5 世纪前期。A 组与中原地区釉陶相同, B 组则体现了更多的地方因素。高句丽釉陶可分为甲、乙、丙三组, 甲组年代为 4 世纪中期前后, 下限约到 4 世纪末, 乙组约在 5 世纪初到 6 世纪前半, 丙组釉陶约在 6 世纪之后。甲组既有汉晋中原风格, 也受到南方青瓷影响, 乙组合稳定, 地方因素鲜明, 丙组或与北魏釉陶存在某种联系。

关键词: 东北地区; 3-6 世纪; 高句丽; 釉陶; 文化因素

中图分类号: K871 文献标识码: A

东汉政权灭亡后, 中原北方地区一度发达的低温铅釉陶随之进入衰落阶段。以往由于资料的局限, 古陶瓷界对 3-6 世纪北方地区釉陶生产的面貌并不是很清楚, 仅对西晋釉陶^[1]及高句丽釉陶^[2]有所涉及。近年来随着辽宁北票喇嘛洞墓地、吉林集安禹山 M3319、集安国内城体育场地点等一批新材料的揭示, 这一时期东北地区的釉陶资料大为丰富, 进行综合比较研究的条件较之以往成熟了许多; 同时, 陕西咸阳平陵十六国墓地、山西大同地区诸北魏墓群等资料的刊布, 也使我们能以更开阔的视野关注和研究两晋南北朝时期北方釉陶的发展态势。至于 3-6 世纪中国东北地区出土的釉陶, 无论从发展的阶段性上, 还是从地域特征上, 都可以分为辽宁地区魏晋十六国釉陶以及高句丽釉陶两个系列。本文拟结合新发表的资料, 重点对这两个系列作初步探索。不当之处, 敬希指正。

为研究的方便, 现将辽宁地区魏晋十六国墓葬出土的釉陶列为表一。

表一 辽宁地区魏晋十六国墓葬出土釉陶统计表

序号	墓葬名称	出土釉陶类型/数量/尺寸 (高度, 单位: 厘米)	出处
1	沈阳伯官屯 M5	酱釉双系罐 1 (6.5)	[3]
2	辽阳三道壕 M8	酱釉双系罐 1 (6.8), 酱釉小壶 1 (3.1)	[4]
3	朝阳十二台砖厂 79 年 3 号墓	酱釉双系罐 1 (3.6)	[5]
4	北票喇嘛洞 I M30	酱釉四系罐 1 (9.4)	[6]
5	北票喇嘛洞 II M64	酱釉四系罐 1 (10.5)	[6]
6	朝阳王子坟山墓群台 M8705	豆青釉陶罐 1 (7)	[7]
7	北票喇嘛洞 II M28	酱釉羊形器 1 (26.2)	[6]
8	锦州前山墓	青绿釉钵 1 (6)	[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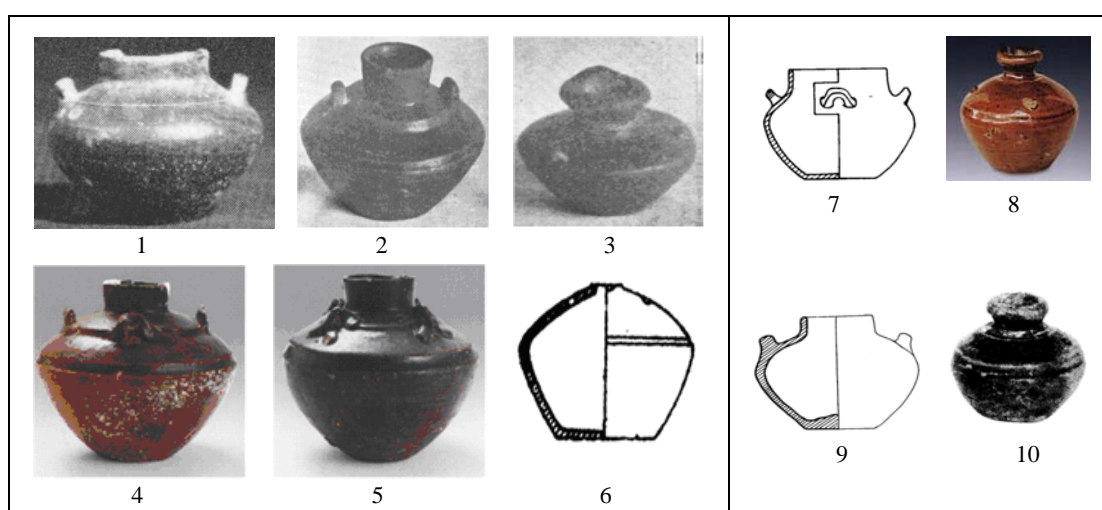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 (编号 2007JJD780114)、吉林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青年基金项目 (2005QN002) 资助。

9	朝阳十二台砖厂 88M1	酱釉罐 2 (8.7)	[9]
10	朝阳袁台子壁画墓	酱釉钵 6 (2.9-3.8), 茶褐釉钵 8 (2.9-3.7)	[10]
11	北票喇嘛洞 II M148	黄绿釉罐 1 (16.5)	[6]
12	北票冯素弗墓	黄绿釉壶 1 (32.3)	[11]
总计	12 处墓葬	釉陶 26	

上表之外，喇嘛洞墓地 II 区的 M9、M17、M33、M294、M329、M358 也发现了釉陶器，但资料尚未刊布。可将如上釉陶分为 A、B 两组。

1、各组特征

A 组 包括沈阳伯官屯 M5、辽阳三道壕 M8、朝阳十二台砖厂 79 年 3 号墓、北票喇嘛洞 I M30、北票喇嘛洞 II M64 等几处遗存。釉陶类型较少，红褐色胎，釉色只有酱釉一种，器形仅见双系、四系的小罐以及无系的小壶（图一）。



图一 辽宁魏晋十六国时期的釉陶（A 组）及参照图（比例尺不一）

1.沈阳伯官屯 M5 2、3.辽阳三道壕 M8 4.北票喇嘛洞 II M64 5.北票喇嘛洞 I M30 6.朝阳十二台砖厂 79 年 3 号墓 7.洛阳谷水晋墓 M4 8.临沂洗砚池西晋 M1 9.嘉峪关西晋墓 M6 10.南京仙鹤观东晋墓 M6

B 组 主要包括北票喇嘛洞 II M28、朝阳十二台砖厂 88M1、朝阳王子坟山墓群台 M8705、朝阳袁台子壁画墓、北票喇嘛洞 II M148、北票冯素弗墓等几处遗存。釉陶类型趋于多样，胎色除红褐色外，还有烧成温度较高的灰胎；釉色仍以酱釉为多，另有黄绿、茶色、黑褐等釉；器形有羊形器、壶、罐、钵等，器体明显增大（图二）。

2、各组时代的推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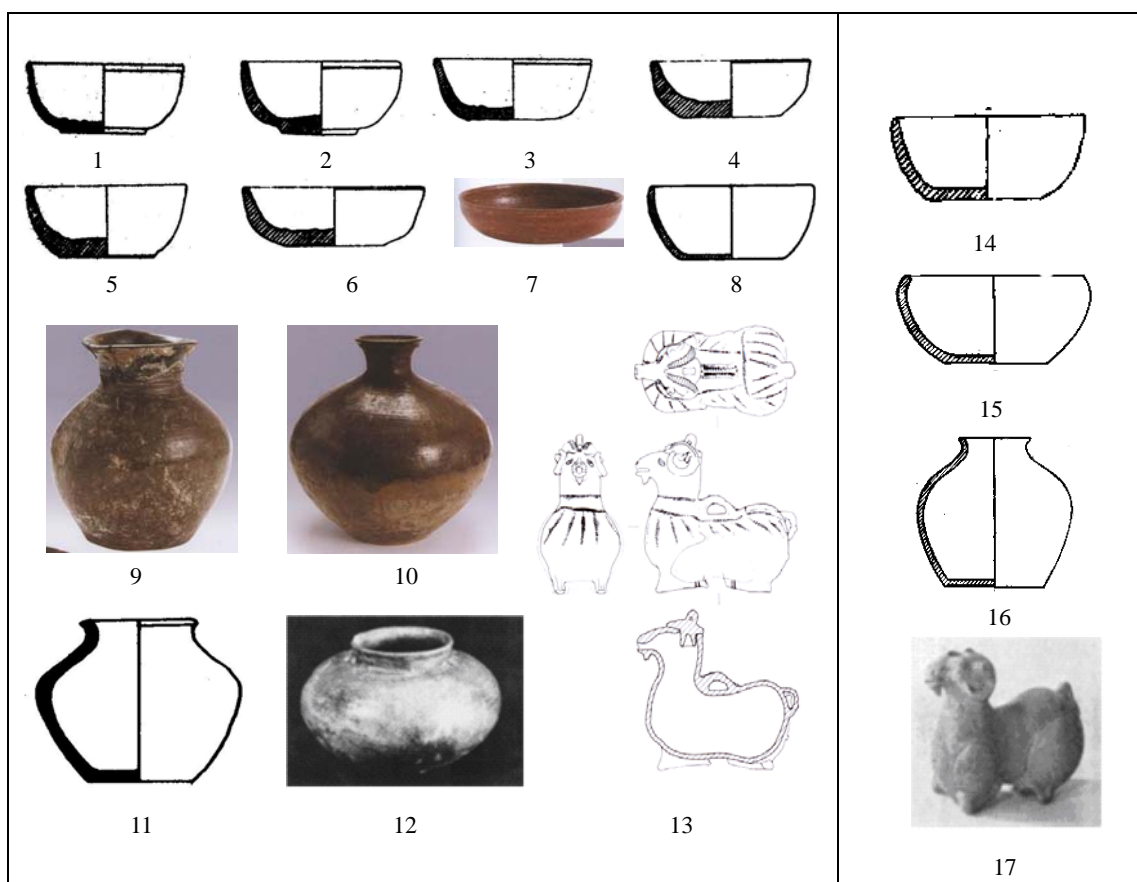
A 组中伯官屯 M5（M4-6 为墓室相连的 3 座墓）的釉陶出土在漆奁内，漆奁内同时出“位至三公”铜镜以及纹饰锈蚀的铁镜；十二台砖厂 79 年 3 号墓出土的铜镜锈蚀较重，镜背花纹与“位至三公”镜极其相似。“位至三公”铜镜东汉晚期时期出现，西晋特别流行^[12]。与三道壕 M8 号墓同在一墓地的 7 号墓出土“太康二年（281）八月造”的瓦当。喇嘛洞的两座墓，材料发表欠详细，但同墓地的 M314 也出土了一件“位至三公”镜^[13]。综上可以推断，A 组釉陶的年代为曹魏末到西晋，下限在 4 世纪初。

B 组中冯素弗墓时代明确，为北燕太平七年（415）；袁台子壁画墓有“二月己……”的墨书题记，田立坤先生推断最有可能是 354 年，其次是 366 年^[14]；王子坟山墓群台 M8705，简报定为两晋，该墓出土的双联腹陶壶与大同南郊北魏迁都平城初期（368-439 年）的墓葬

M170 出土的双联腹陶罐形制如出一手^[15]；十二台砖厂 88M1 出土完备的甲骑具装，时代在前燕也无疑问；喇嘛洞 II M148 褐釉羊，与南京象山东晋初年 7 号墓出土青瓷羊形器十分接近^[16]；前山 M1 出土的圆形陶榻在南方地区东晋出现并流行^[17]。综上可以推断，B 组釉陶的年代为东晋十六国，约从 4 世纪初到 5 世纪前期。

3、各组釉陶的文化因素

A 组中双系、四系的酱釉小罐以及无系的酱釉小壶，是黄河流域西晋墓（如洛阳谷水 M4^[18]、临沂洗砚池 M1^[19]）常见而具有指征性的随葬器物，在长江下游（如南京仙鹤观 M6^[20]）以及河西一带（如嘉峪关 M6^[21]）的两晋墓中也屡有发现（参见图一）。东汉政权灭亡之后，中原地区一度发达的釉陶生产全面衰落，这两种釉陶器即成为整个曹魏西晋时期釉陶生产虽一蹶不振，但仍一息尚存的象征。辽宁地区所出者，与中原基本没有差别，不排除有从内地输入的可能。



图二 辽宁魏晋十六国时期的釉陶（A 组）及参照图（比例尺不一）

1-7. 朝阳袁台子壁画墓 8. 锦州前山墓 9. 北票喇嘛洞 II M148 10. 北票冯素弗墓 11. 朝阳王子坟山墓群台 M8705 12. 朝阳十二台砖厂 88M1 13. 北票喇嘛洞 II M28 14. 锦州前燕李廆墓 15、16. 朝阳后燕崔暹墓 17. 南京象山东晋初年 7 号墓（14-16 为泥质灰陶，17 为青瓷）

B 组釉陶中的酱釉，应是 A 组西晋因素的沿袭。但黄绿釉等多种釉色的出现，突破了曹魏西晋酱釉一统的格局。平底或饼状假圈足钵、罐出土数量较多，器形与锦州李廆墓（324 年）^[22]、朝阳后燕崔暹墓（395 年）^[23]以及袁台子壁画墓等辽西三燕（部分为东晋初）墓葬经常出土的轮制灰陶钵、罐相同，体现了釉陶制作中的本地因素。至于褐釉羊形器，显然是受到南方瓷器影响而出现的器形。

二

中国东北地区高句丽遗址出土釉陶数量较多，列表二。

本文并不打算对高句丽釉陶进行细致的类型学分析，只是在总结以往学者的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结合最近几年来的新发现，将高句丽釉陶分为甲、乙、丙三组。

1、各组的特征

甲组 主要包括集安禹山 M3319、集安国内城体育场地点灰坑、集安禹山 JYM3501、集安七星山 M96、集安禹山 JYM1340 等出土的釉陶。器物釉色复杂，有黄釉、茶绿釉、酱釉等；造型多样，有颈部粗短的四耳壶及无耳壶、盆、甑、釜、耳杯、钵、圆口盘、八折盘、瓮、奩、带盖小罐、鸡首壶、虎子、熏炉等。壶的肩部、盆的底部、八折盘的内壁、奩及鸡首壶的腹部普遍装饰垂幛纹及篦点组合交叉纹，纹饰层次较为丰富（图三）。从禹山 M3319 出土的釉陶观察，釉层厚而莹净，釉面玻璃质感强，有爆釉现象。盘、耳杯的外底有支钉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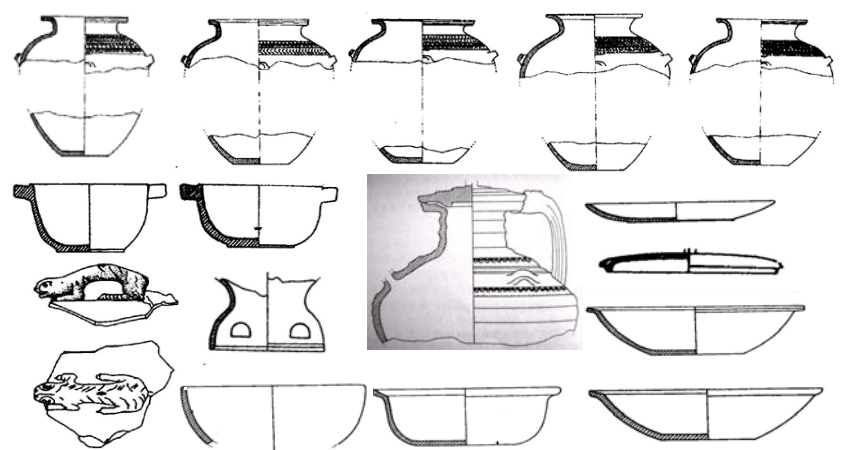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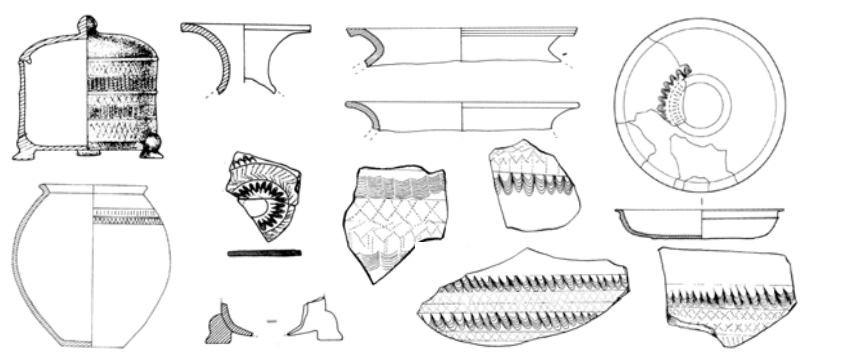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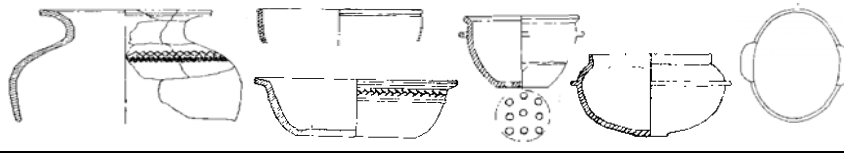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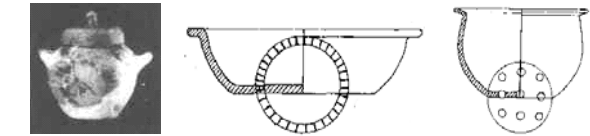
表二 中国东北地区高句丽遗址出土釉陶统计表

序号	遗址名称	出土釉陶类型/数量/尺寸（高度，单位：厘米）	出处
1	集安麻线沟 M1	黄釉壶 2（33），盆 1（8.8），灶 1（16），	[24]
2	集安七星山 M96	黄褐（绿）釉壶 3（均残）	[25]
3	集安万宝汀 M78	黄绿釉壶、罐、盆、灶（均残）	[26]
4	集安禹山 JYM3319（355-357 年）	黄褐（绿）釉壶 6（56-60），带盖盘口壶 1（残），黄釉盆 2（8.3），钵 3（5-6.3），茶绿釉圆口盘（高 1.8-3），八折盘 2（残），耳杯 2（5.5），熏炉 2（残），虎子（残）	[27]
5	集安禹山 JYM3501	黄（绿）釉壶 1（残）、釜 1（8）、甑 1（9）、盆 1、钵 1（残）、耳杯 1	[28]
6	集安禹山 JYM1340	黄绿釉罐 1（14.8）、甑（11）、盆 2（口 30）	[28]
7	集安禹山 JYM3160	黄绿釉釜 1（残）	[28]
8	集安山城下墓区 M983（莲花墓）	绿釉陶壶、灶（均残）	[29]
9	集安粮食局宿舍地点（2000JGL）T2③	绿釉碗 1（残）	[30]
10	集安审计局职工宿舍地点（2000JGSJ）T1③	绿釉盆 1（残），绿釉纹饰陶片 2	[31]
11	集安体育场地点灰坑（2003JGTYC）	黄釉盆 1（6.2），褐釉盖奩 1（20.8），绿釉瓮 1（口 39.6），黄褐、墨绿釉壶、罐、奩、盆残片	[32]
12	集安体育场地点（2003JGTYC）③、④	黄釉、绿釉罐、器盖残片	[33]
13	集安禹山 JYM1897	黄釉盆 1（6.4），釜 1（残）	[34]
14	集安禹山下 M41（JYM1041）	黄绿釉壶 3（40），灶（残）	[35]
15	集安长川 2 号墓	黄绿釉壶 1（56），灶 1（30）	[36]
16	集安长川 4 号墓	黄釉壶 1（31.2），灶 1	[37]
17	集安洞沟三室墓	茶绿釉壶 1（31.5），钵 5（6.6-7.3），耳杯 1（5.7），灶（22.2）	[38]
18	京都大学藏（集安铁路工事出土）	黄釉壶 1（40.5），盆 1（7.9），灶 1（长 67）	[39]
19	桓仁米仓沟将军墓	黄釉壶 3（37），茶绿釉灶 1（27.5）	[40]
20	集安东大坡 M365（JSM365）	酱釉盘口长颈壶 1（25）	[41]
21	抚顺施家北山 M5	茶绿釉罐 1（残）	[42]
22	抚顺施家北山 M2	绿釉陶片	[42]
23	抚顺前屯 M13	茶绿釉罐 1（11.5）	[43]

24	抚顺洼浑木 M2	黄釉罐 1 (15.5)	[43]
25	沈阳石台子山城	1998 年第二次发掘的陶器中, 青灰、黄褐、红褐等釉陶占 1.7%。第一次发掘也出土了少量釉陶。	[44]
总计	约 24 处遗址点	约 80 件 (残约 20 件)	

乙组 主要包括集安麻线沟 M1、集安禹山下 M41、集安长川 M2、桓仁米仓沟将墓、集安洞沟三室墓、集安禹山 M1897、集安长川 M4 等出土的釉陶。器物类型较甲组贫乏, 主要是口沿外展的四耳壶、盆、灶等, 耳杯、釜、钵只有少量发现。仅在四耳壶的肩部装饰垂幛纹及篦点组合交叉纹, 纹饰层次趋于简化 (图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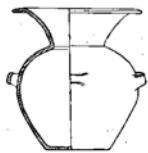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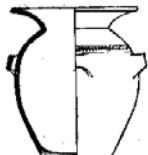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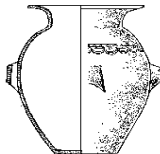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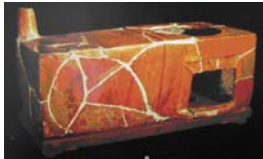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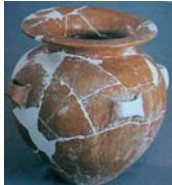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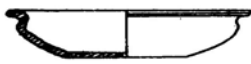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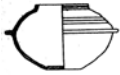
丙组 包括集安东大坡 M365、抚顺施家 M5、抚顺前屯 M13、抚顺洼浑木 M2 等 4 处墓地出土的釉陶。器物类型有盘口长颈壶、粗颈鼓腹罐、矮领球腹小罐。这些器物的肩、腹部都有弦纹 (图五)。


序号	遗址	出土釉陶组合
1	集安禹山 M3319	
2	集安国内城体育场地点灰坑	
3	集安禹山 JYM3501	
4	集安七星山 M96	
5	集安禹山 JYM1340	

图三 高句丽釉陶器物（甲组）（比例尺不一）

2、各组的年代

甲组中禹山 M3319 为阶坛积石砖室壁画墓，1961、1983 年在墓上发现“丁巳”铭文的纪年瓦当，1997 年发掘出土“乙卯年”铭文的卷云纹瓦当。发掘者推测“乙卯”、“丁巳”应分别为公元 355 年和 357 年，1979 年在墓上采集以及 1997 年发掘出土的具有四世纪中叶东晋青瓷特征 4 件青瓷盘口壶也支持这一年代判断。集安国内城体育场地点灰坑，一方面既伴出了典型的东晋青瓷，另一方面在层位上又略早于同地点出土“（戊戌）年造瓦故记岁”题铭卷云纹瓦当的 2 号房址。“（戊戌）年”据发掘者推断，当不早于公元 338 年。所以体育场地点灰坑的时代应在 4 世纪中期前后。综上可将甲组高句丽釉陶的年代定为 4 世纪中期前后，下限约到 4 世纪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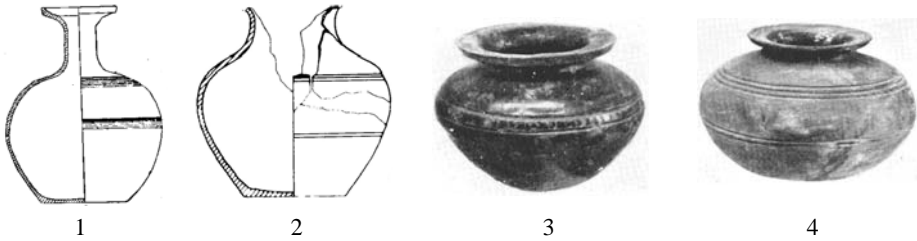

序号	遗址	出土釉陶组合		
1	集安麻线沟 M1			
2	集安禹山下 M41			
3	集安长川 M2			
4	桓仁米仓沟将军墓			
5	集安洞沟三室墓		 	
6	集安禹山 M1897			

参考 釉陶 器物	集安铁道 工事	
----------------	------------	--

图四 高句丽釉陶器物（乙组）（比例尺不一）

乙组釉陶多数出土于大型的封土石室壁画墓，经过前贤多年的研究，对这几处墓葬的时代已有较为一致的认识^[45]。其时代约在 5 世纪初到 6 世纪前半。

出土丙组釉陶的几座墓，都是规模较小的封土石室墓，墓葬的结构，绝大多数的多数研究者都认为与吉林敦化六顶山等地的渤海早期墓葬相近，与施家墓地 M5 形制相同的 M18 还出土了两枚“开元通宝”。东大坡 M365 出土的盘口长颈壶、施家 M5 出土的粗颈罐、前屯 M13 盘口罐都与大同南郊北魏墓 M26、M110 出土的釉陶瓶、陶壶、釉陶盘口罐接近，发掘者推断 M26、M110 的年代约在北魏迁洛的 6 世纪之后^[46]。综上所述，丙组釉陶的年代当在 6 世纪之后。

丙组 高句丽 釉陶	
对比 材料	

图五 高句丽釉陶器物（丙组）（比例尺不一）

- 1.集安东大坡 M365 2.抚顺施家 M5 3.抚顺前屯 M13 4.抚顺洼浑木 M2
5、7.大同南郊北魏墓 M110 6.大同南郊北魏墓 M2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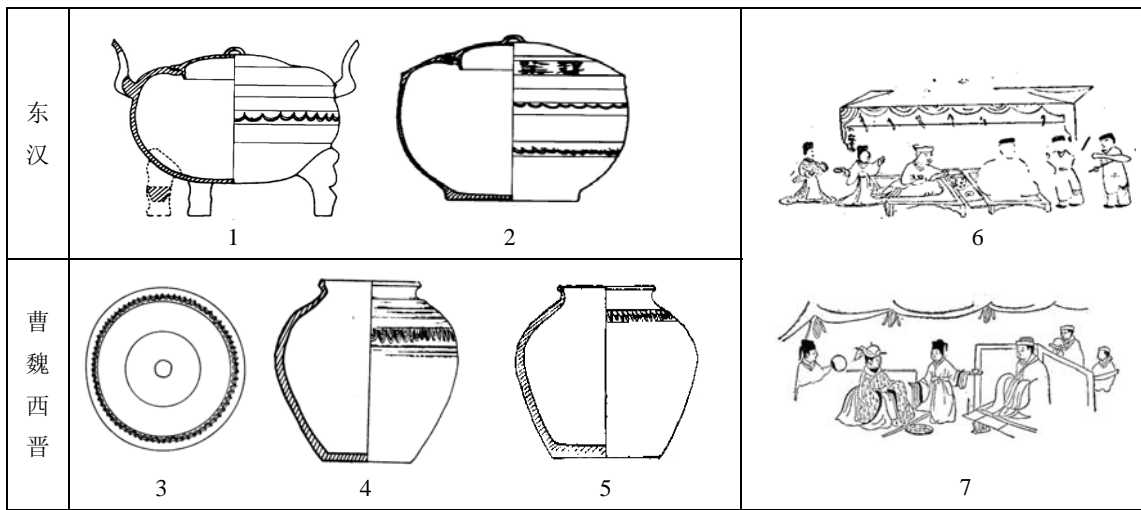
3、各组的文化因素

甲组高句丽釉陶文化因素复杂。中原地区东汉晚期至曹魏西晋墓葬中习见甗、耳杯、奩、盆等器物，辽宁东汉晚期墓葬也不例外^[47]。体育场灰坑出土的奩，与山东邹城西晋刘宝墓出土的釉陶奩形制颇近^[48]。甲组高句丽釉陶中的甗、釜、耳杯、奩等，应是受到内地影响出现的。此外，东汉晚期以来的垂幃（或称垂幔）纹，据称是袭自汉画像石上以裹起的帷帐作为画面边缘的装饰纹带（参图六，6、7）^[49]，见于河南洛阳王城公园东汉墓出土的陶鼎、陶敦^[50]，在河南巩义芝田西晋墓^[51]、甘肃嘉峪关西晋墓^[52]、敦煌祁家湾西晋墓^[53]以及青海大通上孙家汉晋墓^[54]中，也都发现装饰垂幃纹的陶器（图六）。垂幃纹装饰影响到高句丽釉陶并与篦点交叉纹组合使用，已经是东晋中期了。特别值得指出的是，禹山 M3319 出土

的柄端龙首衔含盘口的釉陶鸡首壶，器形仿自东晋青瓷，但肩部设置的四个横耳，肩腹装饰的双重垂幔纹，绝不见于南方青瓷鸡首壶，体现出模仿过程中添加的本地因素。

乙组釉陶中，因循甲组的釜、耳杯、盆数量明显减少，表明这些汉代以来的文化因素在逐渐衰减。壶、灶成为基本的、相对稳定的釉陶组合，凸现了较为鲜明的地域特色。

丙组釉陶与甲、乙两组时代颇有悬隔，器物形态上亦无沿袭、继承。盘口长颈的壶以及粗颈鼓腹的罐，是北魏陶器（包括釉陶）的典型器类，在大同发现尤多，从定都平城到迁洛，壶、罐经历了由溜肩、瘦高腹到宽肩、矮腹的演变^[55]。辽西地区的北魏墓葬，如辽宁朝阳凌河机械厂家属宿舍区北魏墓（88CLM1、88CLM2）^[56]、朝阳南大沟墓^[56]、朝阳西上台珍珠岩厂 M1^[57]、朝阳市老城区养路费征稽处北魏墓 96CZM4^[58]、朝阳工程机械厂墓地^[59]，这类壶、罐也经常出土。此外，前屯 M13 盘口罐与大同北魏墓 M110 出土者如出一手。尽管丙组高句丽釉陶器类贫乏，可资对比的材料不足，但从前述器物形态的相似，推测其与北魏釉陶存在某种联系或是成立的。



图六 东汉魏晋垂幔纹的演进

- 1、2.洛阳王城花园墓 C1M8567 3.巩义芝田墓 88HGZM27 4.嘉峪关壁画墓 M5 5.本溪晋墓
6.辽阳三道壕窑业第四现场汉墓壁画 7.辽阳棒台子 M2 壁画

4、高句丽釉陶的使用

甲、乙两组高句丽釉陶，集中出土于集安的王城遗址及贵族墓葬，体现出较高的使用等级。其中灶及与之配套的甑、釜，显然不适宜实际炊爨，应是专门的随葬明器，故均见于墓葬，在国内城多处生活居址未曾发现。至于壶、罐、盆、钵、耳杯、盘等器类，墓葬之外，居址亦有较多出土^[60]，尤其国内城体育场地点出土的釉陶瓮，高、宽均在 60 厘米左右，盆的口径也近 40 厘米，体量都较大，故不排除这些釉陶器作为日常生活实用器的可能。丙组釉陶均出土在构制较简陋的封土石室墓中，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高句丽末期釉陶使用等级的变化。

三

十六国至北朝初期，北方地区釉陶的生产与曹魏西晋相比，有了一定的恢复。釉陶器的发现有如下几个中心区域。1、朝阳、北票地区；2、集安、桓仁地区；3、咸阳、西安地区。4、大同地区。这 4 个地区也分别是三燕、高句丽、前（后）秦、代魏（平城时代）统治的中心区域，釉陶生产在这些地区的复兴恐怕不是偶然的。

朝阳、北票地区的釉陶，从前述喇嘛洞墓地的材料来看，开始于西晋末期。永嘉之乱，“时二京倾覆，幽冀沦陷。（慕容）廆刑政修明，虚怀引统。流亡士庶，多襁负归之。”^[61]

以致“流人之多旧土十倍有余，人殷地狭。”^[62]《资治通鉴》卷八十九《晋纪》载，“（建兴二年，314）是时中国流民归（慕容）廋者数万家。”慕容廋、慕容皝还多次侵辽东，并徙辽东大姓于棘城^[63]。在这种历史背景下，辽西地区的开发进入新阶段，考古揭示的丰富多姿的三燕遗存即为明证。袁台子壁画墓出土的釉陶碗，内底或外底多数存留垫渣痕3枚，可见采用了多件仰置叠烧的装烧方法，这表明当时釉陶的生产似有一定的批量和规模。5世纪中叶之后辽西的北魏墓葬，迄今未见釉陶出土。究其历史背景，北魏征服北燕的过程中（436年灭北燕），曾一度将当地民众大量西徙，辽西一带釉陶生产的停滞局面应与此有关。

4世纪初开始，中原板荡，北方各族割据混战，高句丽乘隙侵掠辽东，至后燕慕容熙时（5世纪初）最终控制辽东，期间平州刺史崔毖（319年），冬寿、郭充（336年）逃奔高句丽，慕容皝多次东击高句丽（339、342年），高句丽与辽东、辽西联系频繁。集安、桓仁地区高句丽釉陶，从前面的分析来看，始于4世纪中叶前后，应该与此历史态势相关，而与313年占据乐浪郡关系似乎不大^[64]。甲组高句丽釉陶，时代与辽宁地区B组釉陶相当，故一开始就以泛绿的黄釉为基调，器类也较杂多。曹魏西晋时期流行的四系、双系的酱釉小罐以及无系的酱釉小壶在高句丽遗址均未发现。

咸阳、西安地区近年来屡有十六国时期墓葬发现，但与前两个地区相比，出土釉陶器却很少，平陵墓M1最具代表意义^[65]。该墓出土的釉陶器均为黄褐釉，器形有壶、铠马俑和虎子。壶口部残缺，细颈，球腹，与北票北燕冯素弗墓、大同迎宾大道M74^[66]出土的釉陶壶十分接近。虎子前端管口外凸，背有提梁，器形与冯素弗墓出土青铜虎子近似，类似的虎子，在南方青瓷中非常多见。釉陶的铠马俑，目前仅见于这一地区。

大同是北魏釉陶集中发现的地区，南郊、七里村、迎宾大道、沙岭40余座墓葬^[67]，出土釉陶容器约70件，绝大多数为酱黄釉，根据X射线荧光分析，南郊墓出土部分釉陶的釉是以铁为着色剂的低温铅釉^[68]。大同北魏釉陶的器形，以壶、罐最多，基本不见碗类。

四个区域釉陶的类型，存在较大差异，反映出釉陶生产的地方性特征。随着北魏统一中原北方，除了高句丽统治的集安一地之外，这种地方性的历史背景已不复存在。北朝后期，中原地区釉陶的生产持续下来，同时河北、河南、山东等地揭开了青瓷生产的序幕。青瓷的登场与持续生产的釉陶之间存在何种工艺技术的联系？这个问题已超出本文探讨的范围了。

参考文献

- [1] 谢明良《魏晋十六国北朝墓出土陶瓷试探》，（台湾大学）《美术史研究集刊》第一期，1994年。
- [2] 三十年前，日本学者岡崎敬（1979）曾简要叙述高句丽釉陶的器类，并认为可能与墓葬祭祀有关。（岡崎敬《高句丽的土器、陶器和砖瓦》，《世界陶瓷全集》第17卷《韩国古代》，小学馆，1979年。180-182页。）耿铁华、林至德（1984）在对吉林集安高句丽墓葬出土陶器的综合研究中，将高句丽釉陶出现和流行的时段推定为4世纪初到5世纪末，6世纪之后釉陶已极少发现。同时他们关于高句丽釉陶纯系丧葬明器的看法被此后的研究者普遍接受。（耿铁华、林至德《集安高句丽陶器的初步研究》，《文物》1984年第1期。）朝鲜学者李光熙（1990）认为高句丽釉陶出现于3世纪之前，但并没有提出充足有力的证据。（李光熙《高句丽墓所见釉陶的出现时期》，《朝鲜考古研究》1990年第4期。）乔梁（1999）指出，高句丽釉陶从东晋开始十分流行，北朝时期占据了高句丽陶器的主导地位。他还认为釉陶的广泛流行是高句丽文化面貌剧烈变化的突出表现。（乔梁《高句丽陶器的编年与分期》，《北方文物》1999年第4期。）日本学者东潮（1988）、韩国学者崔钟泽（2000）等人的研究，也都涉及到高句丽釉陶器的编年。（东潮《高句丽文物编年》，《檀原考古学研究所论集》第10辑，1988年。崔钟泽《高句丽陶器的形成》，韩国高句丽研究财团《韩国高句丽研究论文集》，565-604页，2006年。认为高句丽釉陶出现于4世纪之后。）耿铁华（2001）则在原来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将高句丽釉陶分为3期（4、5、6三个世纪各为1期）9段

- (每期各分3段)。(耿铁华《高句丽釉陶器的类型与分期》,《考古与文物》2001年3期。)
- [3]沈阳市文物工作组《沈阳伯官屯汉魏墓葬》,《考古》1964年11期。图版叁之8。
- [4]王增新《辽阳三道壕发现的晋代墓葬》,《文物参考资料》1955年11期。
- [5]李宇峰《辽宁朝阳两晋十六国时期墓葬清理简报》,《北方文物》1986年3期。
- [6]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三燕文物精粹》,辽宁人民出版社,2002年。147页。
- [7]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朝阳王子坟山墓群1987、1990年度考古发掘的主要收获》,《文物》1997年第11期。
- [8]鲁宝林等《辽宁锦州市前山十六国时期墓葬的清理》,《考古》1998年第1期。
- [9]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朝阳十二台砖厂88M1发掘简报》,《文物》1997年第11期。
- [10]辽宁省博物馆文物队《朝阳袁台子东晋壁画墓》,《文物》1984年第6期。
- [11]黎瑶渤《辽宁北票县西官营子北燕冯素弗墓》,《文物》1973年3期。
- [12]徐莘芳《三国两晋南北朝的铜镜》,《考古》1984年第6期。
- [13]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三燕文物精粹》,辽宁人民出版社,2002年。103页。
- [14]田立坤《袁台子壁画墓的再认识》,《文物》2002年第9期。
- [15]山西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大同市博物馆《大同南郊北魏墓群》,科学出版社,2006年。275页。
- [16]南京市博物馆《南京象山5号、6号、7号墓清理简报》,《文物》1972年11期。
- [17]中国硅酸盐学会《中国陶瓷史》,文物出版社,1982年。
- [18]洛阳市第二文物工作队《洛阳谷水晋墓》,《文物》1996年8期。
- [19]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山东临沂洗砚池晋墓》,《文物》2005年7期。
- [20]南京市博物馆《江苏南京仙鹤观东晋墓》,《文物》2001年3期。
- [21]甘肃省文物队编《嘉峪关壁画墓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1985年。31页。
- [22]辛发等《锦州前燕李廆墓清理简报》,《文物》1995年第6期。
- [23]陈大为、李宇峰《辽宁朝阳后燕崔适墓的发现》,《考古》1982年第3期。
- [24]吉林省博物馆辑安考古队《吉林辑安麻线沟一号壁画墓》,《考古》1964年10期。
- [25]集安县文物保管所《集安县两座高句丽积石墓的清理》,《考古》1979年第1期。
- [26]吉林省博物馆文物工作队《吉林集安的两座高句丽墓》,《考古》1977年第2期。
- [27]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集安市博物馆《洞沟古墓群禹山墓区JYM3319号墓发掘报告》,《东北史地》2005年6期。
- [28]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集安市文物保管所《集安洞沟古墓群禹山墓区集锡公路墓葬发掘》,耿铁华、孙仁杰编《集安博物馆高句丽研究文集》,延边大学出版社,1993年。57-59页。
- [29]李殿福《集安洞沟三座壁画墓》,《考古》1983年4期。
- [30]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集安市博物馆:《国内城——2000-2003年集安国内城与民主遗址试掘报告》,文物出版社,2004年。66页。
- [31]同[30],81页。
- [32]同[30],139页。
- [33]同[30],45页。
- [34]张雪岩《集安两座高句丽封土墓》,《博物馆研究》1988年第1期。
- [35]吉林省博物馆文物工作队《吉林集安的两座高句丽墓》,《考古》1977年第2期。
- [36]吉林省文物工作队《吉林集安长川二号封土墓发掘纪要》,《考古与文物》1983年第1期。
- [37]转引自耿铁华《高句丽釉陶器的类型与分期》,《考古与文物》2001年3期。
- [38]集安县文物保管所、吉林省文物工作队《吉林集安洞沟三室墓清理记》,《考古与文物》1981年第3期。
- [39]岡崎敬《高句丽的土器、陶器和砖瓦》,《世界陶瓷全集》第17卷《韩国古代》,小学馆,1979年。180-182页。

- [40]武家昌等《桓仁米仓沟高句丽壁画墓》，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辽宁考古文集》，辽宁民族出版社，2003年。64页。
- [41]张雪岩《吉林集安东大坡高句丽墓葬发掘简报》，《考古》1991年第7期。
- [42]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抚顺市博物馆《辽宁省抚顺市施家墓地发掘简报》，《考古》2007年第10期。
- [43]王增新《辽宁抚顺市前屯、洼浑木高句丽墓发掘简报》，《考古》1964年第10期。
- [44]沈阳市文物考古工作队《辽宁沈阳市石台子高句丽山城第二次发掘简报》，《考古》2001年第3期。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沈阳市文物考古工作队《辽宁沈阳市石台子高句丽山城第一次发掘简报》，《考古》1998年第10期。
- [45]魏存成《高句丽遗迹》，文物出版社，2002年。172-198页。
- [46]山西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大同市博物馆《大同南郊北魏墓群》，科学出版社，2006年。
- [47]如辽阳青年大街汉墓M8（王来柱《辽阳青年大街发现的两座汉墓》，《辽宁考古文集》，辽宁民族出版社，2003年。51-57页。）、沈阳沈州路东汉墓M1（沈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辽宁沈阳沈州路东汉墓发掘简报》，《北方文物》2004年3期。）等。
- [48]山东邹城市文物局：《山东邹城西晋刘宝墓》，《文物》2005年1期。
- [49]卢兆荫《略论两汉魏晋的帷帐》，《考古》1984年第5期。
- [50]洛阳市文物工作队《洛阳王城公园东汉墓》，《文物》2006年第3期。
- [51]郑州市文物考古所《巩义芝田晋唐墓葬》，科学出版社，2003年。88HGZM27出土的盆，41页。
- [52]甘肃省文物工作队等《嘉峪关壁画墓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1985年。M5、M7均出土垂幃纹陶罐，24页。
- [53]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戴春阳、张琬《敦煌祁家湾——两晋十六国墓葬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1994年。M307、M323出土的陶盘内刻划垂幃纹，69页。
- [54]青海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上孙家寨汉晋墓》，文物出版社，1993年。M35、M4出土刻划垂幔纹的陶及釉陶盘，114页。
- [55]山西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大同市博物馆《大同南郊北魏墓群》，科学出版社，2006年。472页。
- [56]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朝阳市发现的几座北魏墓》，《辽海文物学刊》1995年第1期。
- [57]朝阳地区博物馆等《辽宁朝阳发现北燕、北魏墓》，《考古》1985年第10期。
- [58]寇玉峰《辽宁朝阳养路费征稽处北魏唐代墓葬》，《边疆考古研究》第3辑，科学出版社，2004年。314页。
- [59]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朝阳市博物馆《辽宁朝阳北朝及唐代墓葬》，《文物》1998年第3期。
- [60]石台子山城出土釉陶的器类不详，李龙彬曾揭示了T105出土的一件盏，参其《石台子高句丽山城及墓葬发现与研究》，吉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6年。
- [61]《晋书·慕容廆载记》。
- [62]《晋书·慕容皝载记》。
- [63]田立坤《三燕文化墓葬的类型与分期》，《汉唐之间文化艺术的互动与交融》，文物出版社，2001年。
- [64]乐浪郡地区出土釉陶的几处墓葬，如贞梧洞5号墓、土城洞45号墓、南寺里29号墓、贞柏洞69号墓，根据王培新先生的研究，其时代为新莽、东汉前期到东汉末、曹魏前期，与高句丽釉陶出现时间上差度较大。王培新《乐浪文化——以墓葬为中心的考古学研究》，科学出版社，2007年。41、81-85页。
- [65]咸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咸阳平陵十六国墓清理简报》，《文物》2004年第8期。
- [66]大同市考古研究所《山西大同迎宾大道北魏墓群》，《文物》2006年10期。
- [67]山西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大同市博物馆《大同南郊北魏墓群》，科学出版社，2006年。大同市考古研究所：《山西大同沙岭北魏壁画墓发掘简报》，《文物》，2006年10期。大同市考古研究所：《山西大同七里村北魏墓群发掘简报》，《文物》2006年10期。大同市考古研究所：《山西大同迎宾大道北魏墓群》，《文物》2006年10期。

[68]姚青芳《釉陶器的釉成分分析》，山西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大同市博物馆《大同南郊北魏墓群》，科学出版社，2006年。579页。

Glazed pottery unearthed in north-east China from 200 A.D. to 500 A.D

Peng Shan-guo

(Research Center for Chinese Frontier Archaeology of Jilin University)

Abstract: The glazed pottery unearthed in north-east China from 200 A.D. to 500 A.D can be divided into two different sets: the Liaoning area Wei, Jin, Sanyan glazed pottery and the Koguryo glazed pottery. Group A of the Liaoning area glazed pottery is similar with the inland and Group B reflects more local characteristics. Group A of the Koguryo glazed pottery contains complicated cultural influence of the inland pottery and the northern celadon; Group B reflects more local characteristics; Group C may be related with the North Wei glazed pottery.

Keywords: north-east China; Koguryo; glazed pottery; cultural influence

收稿日期: 2008-04-25

基金项目: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编号 2007JJD780114）、吉林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青年基金项目（2005QN002）资助。

作者简介: 彭善国，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教授。